

# 台灣報紙對大陸社會新聞的報導

徐宗懋

台灣報紙媒體對大陸社會新聞的報導受兩項客觀因素影響：一、兩岸官方新聞機構新聞管制政策。二、兩岸經貿往來和人民交流所產生的利益焦點以及知性興趣。

就時間來劃分。一九八七年台灣開放大陸探親是一階段，而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又產生另一階段。

戒嚴時代，報紙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兩岸政治激烈對立。報紙對中國大陸社會新聞的報導受嚴格的管制，大陸的報刊雜誌列為「匪情資料」，即使是作為報館資料的一部份，也需向有關情治單位負責，而撰寫大陸新聞中有關大陸的機構都需加上括號，或加上「所謂的」三個字，以示不承認或偽之意。甚至有一陣子為了稱對方為「中共」或「共匪」亦會有情緒之爭。在這種政治大背景中，報紙上的大陸社會新聞實質上成為政治宣傳的一部份，目的在於揭露大陸社會生活的一窮二白，以反映中共的殘暴不仁。這些資料多取材自海外的報刊媒體，至於第一手資料則是由投誠到台灣的「反共義士」現身說法，講述文革期間大陸上種種駭人事件，一字一淚。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國總統尼克森打開中國大陸大門之前，大陸內部真相極少為外人所知，西方世界相當程度瀰漫著對文革美好想像的主觀情緒，不少知識分子相信中國確已達致一種完美的社會。現在回顧起來，當時台灣對大陸社會負面的報導，尤其有關文革中妻離子

---

徐宗懋：中國時報總編輯特別助理

本文曾發表於一九九四年四月台大新聞研究所舉辦之「兩岸情勢與新聞傳播」研討會，經作者同意增刪後發表。

散和幹部整人鬥爭之殘酷，雖然帶著政治宣傳的用意，但卻較西方媒體中許多對文革一廂情願的美好臆測接近事實。畢竟中國人基於共同的語言、文化和習性，更能掌握彼此的政治權力、人倫虛實的各個層面。

儘管如此，強烈的政治目的也使台灣報紙淪為純粹的工具，刻意忽視了社會或文化中產生良善結果的因素和動力，使得報紙無法真正反映社會全貌，也無法藉以正確掌握社會的走向。一九八七年，台灣開放對大陸探親後，這種缺失立刻暴露出來。

儘管台灣當局開放大陸探親一開始是基於人道理由，在內部輿情壓力下讓一九四九年以前來台的大陸人士，能夠回中國大陸探親，以解四十年隔絕之苦。但隨著中國大陸門戶進一步開放，同時中共爲了統戰需求提供各種優惠給台灣同胞，再加上台灣島內政治多元化迅速發展，國民黨政治控制力大幅減弱，台灣的大陸探親熱潮立刻演變爲一般人民赴大陸探親、旅遊、經商、投資的巨流，政府政策雖不允許，但實質上又無力阻止，以致最後被迫逐一開放。

儘管探親政策已定，但台灣政府仍禁止新聞記者赴大陸採訪。一九八七年，自立晚報派遣記者李永得和徐璐赴大陸採訪，成爲轟動一時的新聞。隨後新聞局控告兩人違法，這場官司以李、徐兩人獲勝爲終，並開啓台灣記者合法赴大陸採訪的新階段。其實在李、徐之前，已有台灣報紙派遣持第三國護照的駐外記者，進入大陸採訪，但對新聞事業的影響上，仍以李、徐事例最具意義。

就客觀工作條件來說，一九八八年全年至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間，是台灣記者赴大陸採訪的黃金時期。北京方面張開雙手歡迎，駐外使館簽發簽證將新聞記者與一般人民一視同仁，並不刻意區分，因此台灣記者往往能輕易拿到兩年多次出入境簽證，採訪各單位也無任何困難。

面對新的局勢，報紙也開始調整內部作業，增設「大陸新聞版」，一般有半版大，報導大陸人民的食衣住行的軟性新聞，至於中共的重大政治、經濟事件仍依過去的作法，置於要聞版。過去的「匪情資料研究室」或「大陸資料研究室」的研究人員，開始走出資料陳列的辦

公室，進入大江南北採訪，由內勤人員變成外勤人員，而各路線記者也常因工作需要進入大陸採訪。

兩岸初次接觸，仍受對立時期殘餘觀念和情緒的影響。一般台灣人民對大陸的直覺印象是貧窮落後。儘管它是事實，但政治宣傳的灌輸使它幾乎轉化為台灣人民對大陸同胞的盲目的優越感，成為不容易超越的心理狀態。因此，台灣報紙開始對大陸社會作第一手報導時仍然反映了這種心理特質，著重強調大陸社會的負面。最明顯的就是隨著探親所衍生的不良現象，絕大部份的大陸親友被描繪成認錢不認人、貪得無厭、想辦法出國卻從不知體諒台灣親人的難處。中共幹部要不是蠻橫霸道，就是土得可笑。

或許有許多真實事例可以支持上述報導的客觀性，但那些語多嘲諷的標題、漫畫和文字卻又明顯流露著某種敵意和優越感。報紙對於探究這些負面現象的深層原因，以及同時挖掘改革開放後促使社會進步的正面的人、事、物並未真正下功夫。以致於兩岸對大陸社會新聞的報導幾乎黑白分明，大陸報紙報導本身社會事務永遠是一片光明，而台灣報紙談起大陸如果不是一片黑暗，起碼也是混沌不明。當然，在兩岸政治上仍處對立衝突，敵我關係猶在的時刻，台灣報紙報導大陸社會新聞如果採取正面的角度，也可能與一般讀者的主觀感受格格不入，容易被感覺或「為敵人宣傳」而遭到質疑和排斥。

這種現象對台灣報紙而言，一直要到一九九〇年後才算消退，有關大陸社會較客觀全面的報導才逐步建立。那時，台灣赴大陸旅遊、經商的人次大幅增加，以致於到了一九九三年台灣地區出國旅遊的近四百萬人次中，將近有二分之一是前往中國大陸。緊密頻繁的往來使得兩岸人民更加了解彼此，而且也意味著更多的利益結合，通商通婚更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促成更深的情誼。這種發展無疑從根本上決定了台灣報紙報導大陸社會所持的基本觀感和態度。尤其是經濟性質新聞必須更為客觀，因為它牽涉到台灣的許多個人、團體，甚至整個台灣經濟成長的重大利益，任何刻意偏頗的報導因傷害實質利益而勢將遭受排斥。

儘管台灣報紙對大陸社會新聞報導日趨成熟完整，但是北京政府

對於台灣記者的限制卻更為嚴厲。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是一分水嶺。即如以上所述，六四事件前的一年半時間是台灣記者赴大陸採訪的黃金時間，採訪工作幾乎只有形式上的限制，不僅台灣記者如此，一般外籍記者亦享有較大的活動空間。

六四事件震驚全世界，其中一大原因就是整個過程經由媒體報導廣布全球，引起世人的高度關注，同時又回頭過來鼓舞了示威者的士氣，使其進一步採取持續的抗爭活動。當然，中共高層的分裂是大陸內外媒體突獲自由的最重要的因素，由於支持趙紫陽一派的暗中支持，大陸報刊媒體突然得以大幅報導要求改革的示威活動，諸如「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等中央級單位的工作人員甚至集體上街遊行。然而媒體的開放和支持並沒有轉化為趙紫陽一派政治上的優勢。隨著趙紫陽的垮台，鎮壓行動就緒，北京當局對大陸內部媒體的控制開始緊縮，六月一日至三日鎮壓前幾天，天安門廣場的喇叭不斷呼籲香港、台灣記者立即前往記者協會報到。由於擔憂採訪工作受到限制，多數港、台記者對這項呼籲並未理會。必須說明的是，示威活動達到高潮，大陸媒體直接捲入的時候，港、台記者由於同屬炎黃子孫，而且能夠將大陸發生的事情直接傳布到海外華人世界，所以受到一般人民熱情的對待。這段期間也是大陸記者與台灣記者來往最密切、情誼最深刻的時候。

六四事件以後，北京當局對台灣記者嚴格管制，更由於發生一名台灣記者試圖協助營救學生領袖事件，更使中共安全單位與台灣新聞界關係緊張。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至一九九二年春鄧小平南巡之間，中國大陸政治氣氛沉悶，新聞和文藝政策受到嚴厲箝制，台灣記者前往大陸採訪困難倍增。通常必須事先填妥採訪主題、對象、地點和明確時間，社會性的題材常遭對方以「礙難安排」婉拒。一般批准採訪的題材多半是政治會議，如共產黨的全會、人大和政協會議之類，還有兩岸之間的學術會議由於具有推動雙方交流的政策作用，較易批准。雖然如此，這中間有一項例外，即是一九九一年中的華東大水災，北京方面採取接納海外賑災的政策，因此對於台灣記者申請採訪災區大開綠燈。因此該年，台灣報紙大篇幅刊載了記者深入災區的深度報

導，在台灣激起廣泛的同情和實質的捐助行動，其中包括台灣慈濟功德會在貧困的安徽災區興建大量住宅，發放糧食衣服免費提供災民，儘管爲了政治理由，北京命令大陸媒體對此隻字不提。

一九九二年春天鄧小平南巡以後，大陸經濟發展進入另一個高峰，然而政治控制卻未曾稍歇，對台灣記者採訪的限制也沒有放鬆的跡象，尤其對於接觸大陸內部民運分子的記者更嚴加監控。然而，台灣對資訊的需求已成爲客觀的需要，大陸逐漸成爲台灣最大的出超市場（透過香港爲貿易中介站），有關大陸的一切越來越影響台灣人民的生活。台灣報紙紛紛設立了大陸版，由專門的大陸新聞中心負責。有關大陸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新聞相當客觀完整，各方觀點兼具，以致於十分有趣的是，許多中共幹部曾表示喜歡看台灣報紙中的大陸新聞，他們是透過看台灣報紙來較全面地了解大陸上所發生的事情。

一般說來，台灣報紙上的大陸新聞來源有三：一是海外電訊、報紙和期刊；二是本身記者的採訪報導；三是大陸記者或作家以筆名撰寫的報導。迅速引述海外媒體有價值的新聞是現代報紙的一般性作業，在資訊大量交流的今天是習以爲常的作法。至於本身記者的採訪報導，政治事務的採訪報導最爲困難，因爲一篇客觀真實的政治報導幾乎不可避免地與北京政府的宣傳發生矛盾，而引起後者的不滿。社會性新聞較容易過關，這兩年台灣報紙出現愈來愈多的大陸社會新聞，包括台商在大陸投資的種種境遇、兩岸婚姻、大都市的民工潮等。至於四川的農民暴動或大邱莊的禹作敏事件，台灣記者均曾在事後前往事件的現場。只要報導的基調立於客觀及善意，北京方面多半不會刻意爲難。不過這一部份的判斷十分主觀，所以許多社會新聞常採不署名的方式，以避免無謂的困擾。

至於由大陸記者或作家撰稿刊於台灣報紙也是一種突破過嚴限制的變通方式，而且大陸人較了解大陸事情，相對較高的稿酬有利於其積極性；然而缺點是大陸的寫作方式不一定適合台灣讀者，譬如虛詞過多、文句冗長鬆散。

此外，台灣報紙還有製作專刊，大篇幅地報導各省分的經濟、社

會、文化等層面，這種方式有時反而更容易獲得中共官方的支持與協助。台灣報紙也藉用這種方式將重點由中央局部地轉移到地方，並深入地方的各種社會現象。總的來說，各省專刊的製作是台灣報紙採訪報導大陸新聞最大的動員方式，由於涉及較大的經費開銷，只有大報能夠進行這種投資。

綜觀上述，一九九〇年以來，台灣報紙對大陸社會新聞的報導越來越客觀深入，層面也不斷擴大，它是兩岸交流日趨緊密的客觀產物。而隨著兩岸關係進一步深化，台灣報紙的大陸社會新聞也將表現出一致的趨勢。